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moody landscape. On the left side, there is a cluster of blue flowers with green leaves.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are large, textured orange and yellow rocks.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dark blues, oranges, and yellows.

昌耀诗文总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昌輝詩文集

乃正題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昌耀诗文总集/昌耀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0. 6

ISBN 7 - 225 - 01663 - 6

I. 昌… II. 昌…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诗歌-文学评论-中国-当代③书信-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33349号

昌耀诗文总集

昌 耀 著

责任编辑: 班 果 王绍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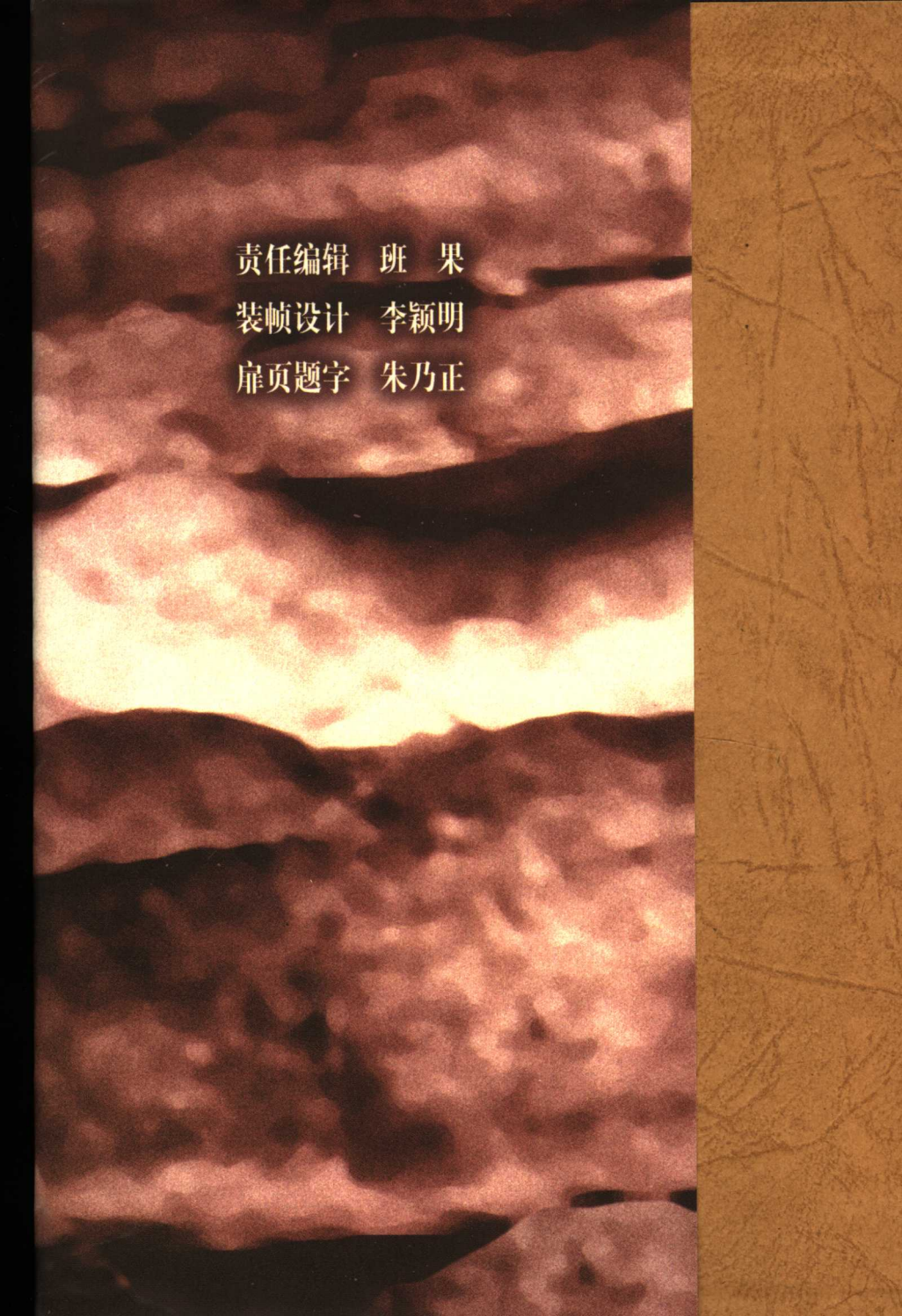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 行: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青海西宁印刷厂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县东山镇金箔路203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30
字 数: 160万
插 页: 3
版 次: 200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 - 225 - 01663 - 6/I·402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责任编辑 班 果

装帧设计 李颖明

扉页题字 朱乃正



作者像

出版说明

昌耀是中国诗坛一位有待人们进一步评价和认识的重要诗人。经过 40 余年的默默努力与追求,他早已成长为一棵诗歌巨树。他的诗中所葆有的理想主义与浪漫气质、悲剧精神和苦难意识,是与整个人类精神传统相接的;他在诗歌中的冒险历程和由此创造的天籁般的意境、独特的意象群落、极富个性的象征系统坚持并拓展了诗歌史的疆域,显示出了巨匠品格;又由于他在语言的矿山和熔炉里炼取了真正的精金美玉,古语新用,旧词重铸,使他在汉语言的遗产面前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和创造者。

有论者认为,昌耀是“新诗运动史上的大诗人”、“诗人中的诗人”。的确,昌耀崇古但不泥古,求新而不丧失个性立场,其诗歌精神与语言形式既有古典器量,又具现代气派,有着雕塑般的功效和同样撼人的美。

诗歌从来是人类灵魂的休憩之地,也是人类想像力的试验场。更深一层地说,诗歌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标志着一种人文理想的甦醒。

我社曾先后出版《昌耀抒情诗集》、《命运之书》等昌耀专集,此次推出这部卷帙浩繁的“总集”,显示了我们这位诗人的推重,更反映了我们对诗歌事业及其代表的人文理想的尊敬。

青海人民出版社

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代序)

燎 原

—

我接受昌耀临终时的托付为这部《总集》作序。也许，这一托付寄予的情分含义大于他对我个人能力的估价。

1979年，当时在青海读大学的我曾以《严峻人生的深沉讴歌》为题，写下了对于昌耀来说当属他诗歌生涯中对其作品的第一篇评论。1980年，我又在第二篇专论的结尾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至于昌耀的诗歌将表现出怎样的生命力和价值，我不想妄加揣测。因为有白纸上的黑字在，像相信历史的淘汰法一样，我也坚信历史的优选法。”

一个卓尔不群的诗人总是有自己特殊的气象。我想，我是在那时就已确凿地感觉到了他诗歌的最终作为。但尴尬的是，尽管若干年来他的诗歌不时出现在我的理论性笔触中，但我却一直未能说出更为有力的话来。而中国评论界在整个80年代则基本上对他保持着窘迫的缄默。这似乎也正是他作为一个大诗人和先行者的尴尬，因为既有的理论尚不能给出一套对他进行有效诠释的办法。十数年来，我注意到了刘湛秋、邵燕祥、骆一禾和韩作荣等人先后为他所写的有情有义的评论。这是以锐利的直觉对昌耀的诗歌最先表示了激赏的四位中国诗人，也是

给了他孤立的艺术冲刺以最为有力支撑的四位编辑家。然而，使人感到遗憾的是，在诗人们之外的中国评论界，却一直未曾出现一位如同海德格尔之于荷尔德林的那样的批评家，以对他的精神艺术世界作出穷尽其相的诠释。

大约从 90 年代初以来，有关昌耀的评价（而不是评论）已不再成为问题。人们在 20 世纪中国新诗艰难的行程和时光的荡涤中，逐渐看清了一位大诗人的存在。尤其是在他刚刚离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中国天南地北的几十家报刊几乎是以不约而同的联动，用大块大块的版面通过对他诗作、生平的介绍和追念文章，向这位孤寂的外省中国诗人表达敬意。这种罕见的方式，该是意味着历史执意要还归他一个公正？然而，昌耀的确太庞杂，太丰富，也太深奥。在他以青藏高原的方式堆垒的诗歌大块中，也容纳着地质史般博杂的造化与生命的信息，以及灵魂震颤中从大地上弓起的眩目的极光。这种精神与艺术的方式，在 20 世纪的中国新诗史上同样是罕见的。因此，对于他的解读，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的苦闷，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苦闷。

如果昌耀临终对我有关这篇序言的托付不算是谬托知己，那么，我在此所能做的，当是在尽可能的释读中凸显出一些命题，以供那些具有集大成品格的论者在未来作出更有力的延伸和综合考察。我的意思是，随着我们这个时代对昌耀作为一个大诗人地位的确认，也随着这部《总集》对他精神生命世界超出我们想象的丰富信息的提供，关于他的诗歌研究，必将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再度展开。

二

昌耀 1936 年出生于湖南桃源的一个王姓大家族。1950 年他 14 岁时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文艺兵,1953 年夏朝鲜战争即将结束时负伤致残,同年秋季进入河北省荣军学校。1955 年既出于对“开发大西北”号召的响应,又出于对中国西部异域情调的向往——也当然是对自己诗歌未来的期许,而到了青海。接着便是 1957 年因诗歌获罪在青海荒原上长达 20 多年的流放,直至 1979 年复出。他最初的创作当是从朝鲜战场上的文艺兵生涯开始。起先是小说、战斗故事,“动辄洋洋洒洒数千言而仍舍不得煞尾”(《艰难之思》)。他的诗歌创作始之于 1953 年,诸如表现朝鲜战争生活的《歌声》、《祖国,我不回来了》、《你为什么这般倔强》等等。这是在他 17 岁时的人生少年时光。

这部《昌耀诗文总集》由昌耀自己在生前编定。所收作品上自 1955 年,下至他离世前的 2000 年 3 月 15 日。也就是说,所有诗文都是他在青海的创作。是他以 45 年的青春韶华和生命苦难与青海高原相互砥砺的见证。

从个人生命处境和精神行程来考察,昌耀的诗歌大约分为这样四个区段:

1955——1957 年,初到青海的高原风情写生;

1959——1967 年,荒原流放中心灵的磷火流萤;

1978——1986 年,复出之后的心灵史记与高原形体造型;

1986——2000 年,常态生存中的百年焦虑与灵魂烘烤。

想来许多人都会对昌耀写于 1957 年的那首总共只有 8 行的《高车》留下深刻印象:

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是青海的高车
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者/是青海的高车
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仍还是青海的高车呀
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青海的高车于我
是巨人的轶诗

所谓的“高车”者,不过是当年西北各地那种极普遍的牛挽或马挽的大木轮车。但这种称谓的变换却使之立时产生了一种陌生古远的意味。而事实上,北方草原上的突厥时代的确有过一支以这种“高车”为自己命名的“高车部”这样一个部族。在对一个主体意象叠加了这样的双重意念后,他又以高车之于青海的强调使阅读延伸出对于草原的联想。于是,在天低地旷的大高原,那恍然是从地球脊线下端渐渐隆起,逶迤而来,又缓缓而去的高车,一霎时被无限放大在整个天地之间。

《高车》自然算不上昌耀最重要的诗歌,但它之于我们考察时年只有 21 岁的昌耀所显示的信息却是丰富的。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有根柢的诗歌。它的化平淡为神奇的奇崛的诗思,带有滞涩感的为古汉语浸渗的语境,物象处理上由现实场景向历史空间推移的陌生化方式,都体现着惟根柢才能赋予的定力。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与同一时期作为主流诗歌的郭小川、贺敬之的《向困难进军》、《三门峡歌》,以及同是抒写西北或云南边地风情的闻捷、顾工、公刘等诗人的诗歌相比照,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他的这种完全脱离了一个时代基本诗歌语境的语言方式,他之无视同时代的诗歌时尚,在对大地之美的追取中决不动摇的自信,又是从何而来?从昌耀本人以上的履历中,我们似乎并不能

看出他的这种根柢之所出。

在此,我想复述一些相关的信息。昌耀所出生的那个大家族,其宅院是约占去了全村建筑面积一半的一个豪门城堡。但是,这又是一个只为女眷们留守着的城堡,那里的男主人亦即昌耀的父辈们曾先后离家出走,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去实现自己的抱负。他的父亲先是在北京读书,此后又去了延安军政大学。他的大伯王其梅,这位和平解放西藏时军方的最高首长之一,30年代便是在北平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并且是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昌耀还有一个五叔,解放后是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至于其父亲此后如何成为“阶级异己分子”,父亲与伯父这一对当初的革命兄弟,又如何在“文革”中以不同的身份罹难而亡,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我想这个豪门大族的男人们因着相同的血缘而有着这样一些共同的特征:为新鲜事物所召唤的、闯世界的强烈生命冲动;有所作为的男人的抱负;诗书濡染的知识分子趋向;还有一点,这就是无法摆脱的怪异命运。

空城堡中寂寞的童年的昌耀,就是在那时开始翻阅其父亲留在书架上的诸如《阿Q正传》、《浮士德》、《猫城记》等大量书籍和来自香港的进步文化刊物的。继而在1953年进入河北荣军学校后,更是广泛涉猎了郭沫若的《女神》,以及莱蒙托夫、希克梅特、勃洛克、聂鲁达等大批中外诗人的诗作。尤其重要的是,在他的童年时代,他的母亲、二姑母,特别是那个年长他数岁的佃农之女曹娥儿等教给他的大量的儿歌和乡谚俚谣。几十年后,当我们在他的《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中,读到了西羌雪域,一个受难的五口之家在除夕之夜唱着:“咕得尔咕,拉风匣,/锅里煮了个羊肋巴,房上站着个尕没牙”

这样的青海谣谚时，便会确凿地感觉到，这种民间艺术对昌耀不只是作为一种诗歌资源，更通过它的民间况味指向，栽植了昌耀切入大地意蕴的根柢。直至1999年底，昌耀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日中，还能成段成段地背下曹娥儿当年教给他的那些歌谣，以此可见这种民间艺术元素对他的影响之深。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便决定了昌耀此后在诗歌上必然的大作为了吗？我没有根据断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与那些在30岁前就光芒四射，从而完成了自己一生的诗人相比，昌耀显然不能算作天才。但他早慧的先天性诗人趋向又无疑是非常明显的。这其中重要的标志就是——他知道自己的路。作为一种先天性的禀赋，他具有直入事物根柢的尖锐的直觉。比如在少年时代他就能够直接奔向属于他自己的书籍，并从中抽取精髓，使之成为自己血液的一部分。正是这种禀赋，坚定了他对于自己的自信乃至自负，从而使他在一个时代诗人群体共同的大道之外，敢于毫不动摇地在自己的道路上朝前奔赴。

事实上，从1955年开始，在他此后日显浩瀚的创作行程中，我们可轻易地从中理出一条这类高原风情写生诗歌的主线，直至80年代中后期。它们是——《鹰·雪·牧人》、《边城》、《高车》、《风景》、《荒甸》、《筏子客》、《夜行在西部高原》、《猎户》、《酿造麦酒的黄昏》、《莽原》、《湖畔》、《烟囱》、《风景：湖》、《丹噶尔》、《鹿的角枝》、《湖畔》、《日出》、《月下》、《所思：在西部高原》、《在山谷：乡途》、《纪历》、《驿途：落日在望》、《草原》、《放牧的多罗母女神》、《达坂雪霁远眺》……

——这是他笔下的荒甸莽原：“远处，蜃气飘摇的地表/崛起了渴望啸吟的笋尖/——是羚羊沉默的弯角”。而这群被现代文明、也被贪婪的猎枪所追逐的精灵，在仿佛是刚从天边躲过一场

捕杀获得喘息的片刻之后,立时便忘了危险似的,重又“结成箭形的舰队/在劲草之上纵横奔突/温柔得——如流火、金梭……”(《莽原》)。

——这是他笔下刚从湖畔洗浴过的藏族牧人:“浴罢的肌体燧石般黧黑/男性的长辫盘绕在脑颅/如同向日葵的一轮花边/他摇响耳环上的水珠/披上佩剑的长服”,向着他的畜群“曳袖而去”(《湖畔》)。

——这是他笔下东方潮红中的日出时分,一片沙沙作响的天籁中却有着异样的静谧:“静谧的是河流、山林和泉边的水瓮/是水瓮里浮着的瓢”,“埡豁口/有骑驴的农艺师结伴早行”(《日出》)。

那群羚羊执意无视身后险恶的、使人为之揪心的纯真无邪;那位牧人古代武士般的剽悍,以及邀约流放中的诗人至其毡庐,复又叩响手中“七孔清风”的牧笛与之交谈的古雅;那位骑驴的农艺师与“我”在大地曙光中独领的寂寞的西部山乡美色……它们原本就是那样存在的吗?如果是,我们为何在浩如烟海的现当代诗歌中见不到相同的品属?这是中国新诗史上独属于昌耀的一种诗歌。他用敏锐的心灵之光做整个大高原的扫描,继而以自己的情感理想和美学理想进行过滤、剪接和粘贴组合,而最终冲洗出那么精粹的一帧又一帧。其边地异域的神秘绮丽,生命天性的幻灵幻美,固守于时光深处的古老超然,在与现代人类怀着乡愁寻找家园心理渴望的呼应中,就那么轻易地颤动着我们的心弦。这是一种绝对不接受时间冲刷的诗篇。从其超然、纯粹的美学属性上来说,它们是留在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上,那种以心灵与山河私语的唐诗宋词式的诗篇。

三

如果不是因为《林中试笛》中两首加起来共总不过 16 行短诗的偶然事端,昌耀大约仍难逃 1957 年或此后的厄运。一个在艺术上卓尔不群的诗人,其生命姿态往往具有决不接受任何摇撼摆布的可怕的定向性。昌耀在结束了苦难的流放生涯后是这样向世界重新亮相的:“九死一生黄泉路/我又来了/骨瘦如柴/昂起的/还是那颗讨厌的头颅”(《致友人》,原载《诗刊》79 年第 10 期,未收入这部《总集》)。文学史上大量的先例告诉我们,这种姿态对一个诗人的人生之路将会意味着什么。

从 1957 年下半年起,21 岁的昌耀以“囚徒”的身份开始了被流放的生涯。从本质上说,这应该是他命运走向合乎逻辑的延伸。因为自他年仅 14 岁时投笔从戎,从湖南故乡之随部队奔赴东北,继而走出国门开赴朝鲜战场;尤其是回国后本可以从此留在河北,而他却执意要远赴青海——这一步一步离家乡越走越远的人生旅程,都清晰地显现他潜意识中、也同样是来自其家族血缘中一种固执的自我放逐情结(其伯父王其梅此时正在唐古拉山另一侧的西藏,作为这个边疆大区的负责人,置身于推进其民主改革的进程)。只是,这一次的放逐却成了一个戴罪者纹面刺青的被发配。命运可是要以这种残忍的恶作剧的方式来成全他?

头戴“囚徒”荆冠之后,他先是在省城近郊的监狱工厂冶炼钢铁,接着被转移到浅山地区每天抬着上百斤重的条石修筑盘山水渠。在此我想强调这样一件往事:从这个国家政权一位激情的战士、诗人,到几乎是一夜间成为它的“囚徒”,处在青春热

血贲张期的昌耀对于这一冤案的态度可想而知。他先是坚决不服地以文字材料申辩,继而是委屈愤懑得几乎要爆炸了的抗争。就在每天抬着上百斤重的条石修筑水渠期间,有一天,他因体力不支、更因心绪极度的恶劣和暴躁,而致使失衡的石料砸向踝骨,当场便昏死了过去。待醒过来后见管教人员正吆喝着抬他去急救,遂嗷嗷吼叫着宁愿一死而不从。这种负气式的以不惧自残表示抗议的悲愤,直欲让人想到共工怒触不周山的情状。“我无罪;所以我有罪了吗?”——“七月”诗人阿垅 40 年代这愤怒的诗句,该是昌耀此时心情最恰切的表述。昌耀在写于 90 年代的《头戴便帽从城市到城市的造访》等诗文中曾多次提到阿垅,在中国新诗史上,从气质、禀赋到诗歌语言方式夭矫不群的悍厉来说,他们两人当最为相近。而昌耀当时这样反复抗争的结果,则是刑役的层层加码,继而越走越险恶地流徙于祁连山重峦幽闭的山谷,荒原腹地远离人烟的监狱农场。直到“囚徒”生涯结束,流落为西部山乡一个领有五口之家的拖儿带女的“贱民”。

昌耀就是在这样长达 22 年的命运锤砸中,于 1979 年回到《青海湖》编辑部那张曾经属于他的、一个诗歌编辑的办公桌前。他身材干瘦,语言木讷,神情平静中略带拘谨和疲倦。似乎已向命运以妥协的姿态表示了和解。

然而,他就是在这种平静的公民姿态中,紧接着以刊发于《诗刊》上长达 500 多行的《大山的囚徒》,让中国诗界知道了他将是一位什么样的诗人;也让我在今天重新审视他的心灵轨迹时,强烈地感觉到他与命运绝不罢手的顽强纠斗。就是在省城重新安家立命不久,有一日他托我找一套叫作“凌格风”的英语学习磁带,我甚感好奇地问其故,他说自己在“农场”时曾自学英

语,近日读一些英语读物时竟还能粗通大意,所以想把它重新拾起来。由此可见,他即使在九死一生的灭顶之灾中,仍对自己的未来确信不疑。他在那时不但仍然写着不能发表的诗歌,更全方位的做着当时条件下所能允许的一切准备,以待“失道者”的“败北”之日。

现在,当他重新领有了自己的命运,他之于诗歌的写作便一点儿也不感到生手。遂无须在诗坛外围作任何盘桓滞留地径直切入其腹地,以其西部大山荒原上流放生涯记传体的系列长诗,拱起了一列浑莽峥嵘的山系。这是中国新诗有史有来不曾出现过的诗篇,也是由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记,延伸向旷古高原与人类类属生命相互作伐,相互融渗,重又彼此唤醒,互示花雨霞霓的天假大块。

这一记传体系列由这样四部长诗构成,它们是:《大山的囚徒》、《慈航》、《山旅》、《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

从题旨指向上看,这四部长诗的侧重各有不同,篇章构架和语言风致上也反差明显。譬如《大山的囚徒》中他借一个新四军战士出身的州委宣传部长形象,对自己身罹无罪之罪决不言服而拼死抗争心绪的书写,以至虽身陷流放之地却要亡命徒般地逃向“红星高照的京城”,“去公堂击鼓”上告。《山旅》中则通过一个被流放者于大山腹地漫长的生命之旅,传递出轰天响雷般的山河、历史和人民的震怒。这是一首可以和《大山的囚徒》互读的诗作。一个生命在这里所罹受和目睹的一切都是罕见的:在《大山的囚徒》中,当那位“囚徒”抡着八磅大锤于采石场发疯般地拼命时,突然,“我倒下了/石棱穿破了眉骨/血浆从眼眶里迸出”……但生命竟又是如此的顽强,就在他已被装入一只由马

槽改制的棺材行将入殓时，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而《山旅》中大山腹地那荒蛮绮丽的一切更是令人震撼：在大雷雨中的夏夜，闪电的青光，像一条扭曲的银蛇，从山中骑者惊马的前蹄掠过，继而遁向远处，将崖畔的千年古柏，殛作一道通天火柱。但在雪霁月明之夜，则又是另外一番幽雅：长嚎的雪豹从深谷里踱出，双眼闪着荧绿的光，灵巧的身子有如软缎，只轻轻一抖，便登上了河中的冰排，又悄然攀上对岸铜绿斑驳的绝壁……这山河秘境中一切的犷悍、粗涩和绮丽，该是生命在何等强大的震颤中而至洞开之后，对大高原的摄魂！当一部诗歌在获具了如此的原生性大地品质之时，我们的感觉正在向着一部高原史诗靠近。

昌耀在这里感受到了摧肝裂胆般的生命的大挫折，然而，最初那种不惜自残的生命愤怒的对峙，于此则又恰恰向着亲和的形态转换。他开始以对高原古老地力的感应，获得生命的支撑。这便是由《大山的囚徒》到《山旅》所经由的历程。继而，他感应到了高原的温情——“土伯特”，这个在清代文献中指称藏地和藏族，而在此后的汉语词库中湮失了的语词，经由他的诗歌重又复活在现代汉语书面文本中。唐古特——土伯特——吐蕃——藏族，当年我曾问过昌耀，为什么是“土伯特”呢？他说，藏族人原本就是这样自称的。他是要强调一个事物古老的本源，但这似乎更寄予着他对这一事物本源性的感应和理解。是的，正是在这个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高原民族身上，昌耀听到了探究生命奥秘之门最初的解语。

大雪灾以定期的轮回对生存苦难的施加，生存极地上听天由命的旷达和剽悍，乃至狡黠的幽默，尤其是虔敬的宗教感中由对来世的理想所呈现的高于一切的灵魂观念——在高原民族这样一种生命的宗教哲学面前，昌耀体认到了对他来说是最为关